

目录

一、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	1
二、让全面小康激荡中国梦	4
三、改革让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7
四、法治让国家治理迈向新境界	10
五、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核心	13
六、“四个全面”托举中国梦	16
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演进脉络与重大意义	20
八、“四个全面”展现治国理政的新型方法特征	27
九、习式改革战略的六大突破	30

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

——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本报评论员

再没有什么使命，比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复兴更光荣；再没有什么事业，比团结十几亿人民圆梦更崇高。

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12年11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接续奋斗的基础上，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谋划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续写这无上的光荣。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中思接千载，追寻中国梦。深圳莲花山，邓小平铜像前再展宏图，激荡改革潮。纪念“八二宪法”颁行，重申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塑造法治魂。力行八项规定，以上率下言出必果，坚守生命线……履新第一个月，起笔落墨之际，前进航标已然确立。两年多来，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历史，从来都是在直面问题中展开其波澜壮阔的画卷。经济总量领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转变压力，创新能力与发展需求脱节，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治理现代化目标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

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

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两年多来，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举措力度空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破局开篇，公平正义成为全面小康的重要着眼点；推进治党治国治军，反腐倡廉纯洁队伍，正风肃纪凝聚人心；运筹内政外交国防，中国梦与亚太梦、世界梦同频共振……短短两年多时间，科学统筹、协调推进重大决策部署，让局面为之而变、气象为之而新、民心为之而振。事实充分证明，“四个全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

“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阐述，也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哲学基础的揭示。“四个全面”，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主线，勾绘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图景。

很多时候，只有站在历史的峰峦之上，才能更清晰地洞察时代风云，更准确地把握前进方向。90多年来，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基础；到确定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几代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的过程，如此

艰辛，也如此壮阔。“四个全面”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中国道路、增创中国优势。这一战略布局，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它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体现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和中国人民阔步走向未来的关键抉择。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更伟大的征程正在我们面前展开。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这是一场艰苦的奋斗，也是一次豪迈的进军。行走在复兴之路上，中国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国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的明天，直挂云帆济沧海。

《人民日报》（2015年02月25日 01版）

让全面小康激荡中国梦

——二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本报评论员

梦想是最令人心动的旋律，又是最引人奋进的动力。人民的梦想是什么样子？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用朴实的语言，道出了人民心中的梦想，拨动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弦。这个梦想，是人民对民族复兴的美好憧憬，是全面小康的群众表达，是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小康蓝图的生动呈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庄重承诺，展现的是我们党执政的宗旨信念和奋斗情怀。

“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全面小康放在中国梦的大格局中，把全面小康目标升华成民族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今天的神州大地上，全面小康与中国梦相互激荡成人民生活的幸福图景，凝聚为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在中国梦的交响曲中增添了更优美的旋律，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时代主题。

然而，全面小康怎样建成？难点如何破解？这不仅关系全面小康的实现，更关系中国梦的奠基，是推进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两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足迹遍及甘肃、湖北、湖南、内蒙古、新疆、福建、江苏、云南等20多个省区市，念兹在兹的是亿万人民的小康生活，奔波谋划的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大计。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实际，精准聚焦全面小康难点，科学回答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

全面小康，核心就在全面。这个“全面”，体现在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它是不分地域的全面小康，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全面小康。踏访河北阜平“看真贫”，给独龙族乡亲们回信希望“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延安座谈“革命老区脱

贫致富”，从就任总书记之初到羊年春节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这一系列论断，充分体现了把13亿多人全部带入全面小康的坚定决心。

这个“全面”，也体现在涉及的领域是全面的。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小康，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的全面小康，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的全面小康，是“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的全面小康，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全面小康，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全面小康，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开拓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的全面小康……方方面面，着眼的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民主权利如何保障？贫困洼地如何弭平？三农难点如何攻克？文化挑战如何应对？生态瓶颈如何突破？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补齐发展短板的过程，就是提升小康水平线的过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在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论述，抓住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瞄准的是经济、社会和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发展是当今世界潮流，发展是当今中国主题。无论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还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体现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和必然要求。

小康，这个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梦想，今天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人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然而，要把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加起来还多的大国带入全面小康，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壮举，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利益藩篱，实现全面小康才有动力；只有全面依法治国，建立规则秩序、推进公平正义，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障；只有全面从严治党，锻造领导核心、提供政治支撑，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深层次

矛盾问题，以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现代化建设有序进行，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绘就全面小康的宏图。

新的征程正在展开。小康这个穿越无数苦难与辉煌岁月的执着梦想，已经触手可及。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将由我们亲手完成。

“继续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么一种精神，继续保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那么一种警醒”，我们就一定能“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

《人民日报》（2015年02月26日 01版）

改革让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三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本报评论员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 30 多年历程；从现在起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算来大约也是 30 多年。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改革将如何拓展中国道路，我们又该怎样激发改革动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从履新不到一个月就去“得风气之先”的广东考察，宣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擘画改革新蓝图、吹响改革集结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全局和历史的高度，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实现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思想。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革，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最鲜明的特征。党的改革方略步入一个全新高度，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境界。

论方向，“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辙”；论目标，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思路，要坚持“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说关系，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讲落实，要“正确推进改革、准确推进改革、有序推进改革、协调推进改革”……干净利索的思路，逻辑缜密的阐述，体大思精的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让中国新一轮改革方向明确、路径清晰。在被视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 2014 年，改革呈现加快推进之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确定的 80 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 108 项改革任务，共出台 370 条改革举措……数量之多、频率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正化为新一轮改革声势夺人的大潮。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根本在“改革”，关键在“深化”，重点在“全面”。体现在认识论上，就是坚持系统思维，强调不能以偏概全、不能片面理解。比如，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顾此失彼、断章取义。比如，既要讲“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讲如何分好“蛋糕”，也要讲如何做大“蛋糕”。归根到底，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部署的，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

“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要“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充分考虑各项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努力做到眼前和长远相统筹、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减少阻力。同时，也要立足全局抓大事，善于抓住“牛鼻子”，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上集中发力，使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改革循着从易到难、从局部到全局、从增量到存量的顺序展开。今天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就像一筐螃蟹，抓起一个又牵起另一个，必须全面启动；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环环相扣，需要顶层设计。与过去相比，今天的改革既呼唤坚定果敢的行动、百折不回的信念，也呼唤全面系统的认识论、攻坚克难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断，有“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有“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决心，有“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坚韧，有“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的气魄，针对的是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点，直面的是改革深水区攻坚期的特殊阶段，回应的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要求，彰显了当代共产党人执着的改革品格、鲜明的改革气质、奋发的改革精神。今天的改革，不只是为了应对挑战，更是为了把握机遇；不只是为了短期目标，更是为了图之长远；不只是时代要求，更是历史责任。全面深化改革要塑造的，是一个更有实力引领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审视，改革既是驱动力，也是凝聚力；既是方法路径，也是精神内核。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革是贯穿始终的不变逻辑，也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具体历史实践。对于全面依法治国，改革是齐头并进的姊妹篇，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对于全面从严治党，改革是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根本途径，党的领导则是实现改革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把全面深化改革放在“四个全面”中去定位，放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去把握，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为何新一轮改革要在各个领域统筹推进，为何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回望改革历程，话音犹在耳畔。在千帆竞发的时代洪流中，认真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最大范围凝聚改革力量，最大程度增强改革信心，我们将再次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人的激情和梦想长存、决心和勇气仍在，全面深化改革必将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人民日报》（2015年02月27日 01版）

法治让国家治理迈向新境界

——四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本报评论员

多少年来，在人们心目中，改革，就是解放思想敢于突破陈规，就是放开手脚打破条条框框。正因如此，“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为改革划定“法治边界”时，给世界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决策中，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被视为“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成为上下贯通的“姊妹篇”，推动我们的事业滚滚向前。

循此回望，一条治国理政的主线，清晰可见。2012年12月，履新不到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2013年3月，刚刚当选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国人民郑重宣誓，“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两个场景，一种态度：尊重法律、厉行法治，是必须把握好的施政之要。基于30多年的法治实践，经过两年多的法治探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集理论和实践之大成，绘就全面依法治国新蓝图，为法治中国建设标定新的里程碑。

全面依法治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昭告“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彰显法治权威；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发挥法治力量；告诫“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法治实践；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塑造法治信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开阔了法治的格局、丰富了法治的内涵、拓展了法治的外延，让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治国理政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新境界。

将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重大战略布局的一环，标志着依法治国按下“快进键”、进入“快车道”。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等，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回答法治统一性的问题；“五大法治体系”“三个共同推进”“三个一体建设”，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回答法治协调性的问题；“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参与主体的角度，回答法治系统性的问题。特别是回答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既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也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对法治认识的不断深化，正是执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

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到当前中国发展的棋局中，才能体会这一战略部署的重大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无不以法治为框架、用法治作支撑、由法治来贯穿。从简政放权不断深入，到民生事业逐渐完善；从经济改革大刀阔斧，到党的建设抓铁有痕，法治都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果把治国比喻成一本大书，那么法治就是大纲，纲立文顺、纲举目张。治理体系中，法治体系成为关键一环；治理能力中，依法治国成为重要内容，法治的引领和规范，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在更大的坐标系中审视，一个鲜明的感受是，无论是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历程中，还是在中国现代化百年征途上，或是世界社会主义几百年演进中，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举措，都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探索。将依法治国提升到“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的高度，将目标设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立足点是坚持中国道路、完善中国制度。作为治国重器，全面依法治国书写的是法治史的新篇章，开启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战略举措，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共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基本动力、基本保障、基本支撑。法治是框架和轨道，也是理念和方法。重大改革需要于法有据，改革成果需要法治固化，全面依法治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稳定性、规范性；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规治党，依规治党才能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本质一致、辩证统一。没有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在

法治确定为党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今天，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只有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全社会都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把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落实到改革发展的大棋局，法治才能成为中国前进的坚强保障，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

“法者，治之端也。”要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要走好中国道路、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落实好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沿着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法治中国，我们一定能在“四个全面”相互激荡的伟大进程中，绘就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

《人民日报》（2015年02月28日 01版）

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核心

——五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本报评论员

“8000多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与13亿中国人民一起……凝聚成13亿的中国力量”，当热播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以变幻的场景呈现一个古老而又朝气蓬勃的中国，人们在光影交错的时空激荡中深切感受到，“中华号”巨轮行稳致远，需要从容驾驭的领航者；中国现代化列车驰向远方，需要强劲有力的火车头。

这是一组每每读来让人心生感慨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在21个省区市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87.3%的群众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以往相比有好转，77.1%的群众认为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有力度。这是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下正风肃纪的可观实绩，是党的建设进程中从严从实的初步战果。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任伊始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将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落脚到从严治党、使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上。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中央就制定出台八项规定，发出正风肃纪、从严治党的强烈信号，全党全社会为之一振。“开弓没有回头箭”，两年多来，从坚持不懈反“四风”，上紧作风建设发条，到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猛击一掌的警醒，到从严管理干部，完善党的建设制度、党内法规体系，全方位、高标准的管党治党举措，刷新了党风政风，深得党心民心，写下了党的建设新篇章，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局面。在继承优良传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党90多年历史上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构成了当代中国最为关键的“命运共同体”。“既然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正是基于“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号召全党及时解决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认真医治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开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央八项规定为肇始，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以反腐倡廉为动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点是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目标是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是党的建设规律的新探索。焦裕禄纪念馆的深情驻足，民主生活会上的以心换心，中央纪委全会上的谆谆告诫，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亲力亲为……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身体力行，全党同志的积极参与，不断诠释着“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内涵。“全面”是基础，它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既要靠教育也要靠制度，一柔一刚，同向发力；它是建章立制和执行落实的有机统一，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又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强化守纪律、重申守规矩；它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既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又要层层传导压力，全党动手、全党参与。

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关键在治、要害在严。全面从严治党，意味着党的建设要在“严”字上铆足力气、下足功夫。思想上要把好“总开关”，作风建设要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制度落实强调“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反腐败斗争强调“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教育要严、标准要严、执纪要严、惩治要严、制度要严，“严”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从严治党更有其自身规律。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治标和治本的统筹兼顾、自律和他律的双管齐下。这一党

建战略思想，开创了党建新格局，表明我们党对新形势下党建规律、治国理政规律有了新探索、新认识、新创见。

“大盘取厚势，官子有妙手。”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的统一，体现了党的建设与治国理政的统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必须有一个主轴，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和文明，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无可替代，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党的领导是“四个全面”之魂、战略中军帐之帅。全面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核心，就能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方向指引，防止在大的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就能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政治保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共识、凝聚力量。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苦难到辉煌，从贫弱走向复兴，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复兴推进到今天这样的境界，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坚持不懈全面从严治党，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人民日报》（2015年03月01日 01版）

“四个全面”托举中国梦

2015年03月02日

来源：光明日报

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摘自习近平 2014 年 12 月在江苏调研时的重要讲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 3 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摘自习近平 2015 年 2 月 2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2015 年，又一个发展关键期摆在中国面前。

任务艰巨，环境复杂。如何全局谋划、稳步前行？宏阔明晰的战略布局浮出水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者协调共进，推动全新征程。

每个“全面”，都是一项功在千秋而艰辛自见的宏伟工程；每项工程，都与 13 亿中国人的梦想紧紧相连。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迅速在社会各界引发热议，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聚焦的热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今天，小康这一华夏儿女千百年来的梦想，被中国共产党人赋予更深刻的内涵。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李忠杰委员看来，从邓小平构想的“小康之家”到今天的“小康社会”，这一概念随着实践不断丰富。“除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之外，还包括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一系列要求。”

“全面小康，要让不同区域、不同人群共享小康成果。虽然这些年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难题仍未解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张晓强委员话语凝重。

黑龙江省伊春市市长、市林管局局长高环代表对此有着切身感受：“伊春是典型的林业资源型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多年来，我们为生态建设而逐步调减森林采伐限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然而，她依然对伊春的小康征程信心满满。因为，她从伊春经济转型的努力中看到了曙光，更从党和国家的一项项新政中，听到了“不让一个地区、一个人掉队”的庄严宣告。

越美好的目标，越需攻坚克难才能实现。只有实现全面小康，才能跨越通向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李忠杰委员指出，“全面小康”的主要指标，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之后，要在建党100周年时建成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三个梯次递进的目标，共同构成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中国梦。

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举行第十次会议。“突出重点，对准焦距，找准穴位，击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从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样掷地有声的表述，令代表委员们倍感振奋。

李忠杰委员认为，深化改革“要统合好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上有科学完整的总体方案，下有因地制宜、先行先试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推出击中要害的‘硬招实招’”。

正是依靠“突出重点，对准焦距，找准穴位”，伊春才在近年取得了日渐显著的改革成效。高环代表感慨道：“痛定思痛，我们将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放在大

力调整产业结构上。现在基本确立了生态主导型产业体系，伊春还两次被评为‘中国幸福城市’，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

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核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又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令张晓强委员印象深刻的是，本届政府始终致力于强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真招”频出，效果显著。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在方法论上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在思维方面，要坚持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同时，应该有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社会治理的能力、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能力。”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委员如是总结。

全面依法治国：实现中国梦的法治保障

被深圳人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2月28日迎来“满月”，并将于近日开庭审理首起案件。这令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委员十分期待：“最高法巡回法庭的设立，解决了司法行政化、地方化的老大难问题。我们学术界期待过、讨论过，却没料到这么快变成现实，可见这一轮司法改革的确‘动了真格的’。”

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委员常常深入公检法部门调研。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她眼中的可喜变化越来越多了：“公检法更加务实；司法系统更忠于法律，更注重第三方监督考评；长期困扰律师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问题很少再‘现形’，律师的观点受到重视，开始成为司法监督主体。”

“越规者，规必惩之；逾矩者，矩必匡之”——在李忠杰委员看来，“全面依法治国”，既宣示了我们党高扬法治旗帜、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格局的坚定信念，也展示了党依靠法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保驾护航的坚实步伐。

全面从严治党：让实现中国梦的领导核心更加坚强

打虎拍蝇、清理“裸官”、遏制浪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力度空前，让世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勇气与决心。

“作为一名党外人士，我深切感受到从严治党不是口号，执行起来毫不手软。”刘红宇委员表示。

一方面大力反腐败、清理毒瘤，一方面弘扬正确价值观、夯实信仰。冯俊委员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是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这也是十八大以来党风建设的突出亮点。“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三严三实’可见，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树正气、建制度、强纪律、学本领，然后是压歪风、转作风、打老虎、拍苍蝇，两者不可偏废。”

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是实现中国梦的领导核心，必须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必须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必须改善自身的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党自身也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深化党的制度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李忠杰委员认为。

而这个坚强领导核心的未来表现，也令代表委员们有理由充满信心。正如英文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所言：“80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与13亿中国人民一起，为了每一个人的梦想，为每一个梦想搭建舞台。”

（本报记者 王斯敏 曲一琳 周洪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演进脉络与重大意义

李忠杰

2015年02月27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四个全面”，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规划，针对新形势下的机遇、挑战和历史任务而提出来的重要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

这“四个全面”，每一个都有一个逐步提出、日益明晰的过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问题。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小康之家”的设想。2002年，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07年，十七大要求：“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12年，十八大将“建设”改成“建成”，进一步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发展。2012年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问题作出重要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

全面依法治国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加强。1997年，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2012年，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2014年10月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法治建设作为中央全会的专门议题，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

全面从严治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不断对党的建设作出部署。邓小平同志一再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2年的十六大和2007年的十七大，都提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格局。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命题和任

务。2012年，十八大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并再次强调要从严治党。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并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了部署。现在，又直接使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表述。

在逐个强调每一个“全面”的基础上，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大思路的高度，进一步对“四个全面”进行重要整合，明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概念，使这“四个全面”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

从现在公布的材料来看，在起草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过程中，中央对于文件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要“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2014年8月，在就《中共中央全面推行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和建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提出文件要把握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在对《决定》作说明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说明了“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的指导思想。

2014年11月，在福建考察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列举了“三个全面”，要求“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2014年12月，在江苏考察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三个全面”后增加了一个“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这是在公开报道中，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四个全面”并提。由此，“三个全面”进一步上升成了“四个全面”。

这“四个全面”意味着什么？怎么定位？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肯定“四个全面”是“战略布局”，并且第一次亲自用“战略布局”这个词来概括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这说明这“四个全面”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四个全面”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路和蓝图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治国理政需要有大视野、大思路、大战略。尤其是在某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治国理政的大思路至关重要。思路错了，就会把国家领错方向；思路有毛病，也会产生很多消极影响；而思路正确，就能够把国家引向兴旺发达的未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伟大的历史转折，随之改革开放的潮流蓬勃兴起，使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国社会主义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确认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为改革开放打开了广阔的空间。所有这些，都是在关键时刻把国家领向了正确方向，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遇到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十字路口，各种思潮纷纭复杂，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往何处去？

从十八大到现在，一共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发表了大量重要讲话。这些讲话，大都具有开局的性质，实际是从不同角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执政、如何治国、如何引领国家走向未来的问题。因此，也可以说，初步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长期思考和谋划的关于治国理政的大思路、大蓝图。毫无疑问，总书记未来必定会继续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按时间计算至少会有现在的五倍，因此，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思路和蓝图今后还会继续丰富和发展，并不断接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它们怎样归纳整理，构成什么样的完整体系，也还需要继续研究。但可以肯定，这些讲话，具有习近平总书记自己鲜明的风格，体现了他对于治国理政大思路的思考和理念。

就“四个全面”而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将它定位为“战略布局”，因此，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大思路和大蓝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大思路。

认真领会和把握“四个全面”的逻辑关系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除了定位外，它还包含哪些内容？相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整体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亲自做了说明。他指出：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说明，清楚地界定了每个“全面”的地位、作用，也从总体上界定了“四个全面”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说，这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它包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一系列要求。主要指标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即两个数字都要翻番。在此基础上，还要在建党100周年时建成现代化国家。过去还有一个“基本”，叫“基本实现”。现在“基本”两个字已经去掉了，就是实现，这样要求就更高了。进一步，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些连贯的目标，构成了非常豪迈的中国梦。

从全面深化改革来说，十八大规定的到2020年的目标，同时包含发展目标和改革目标两个方面，报告的小标题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从逻辑关系上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和建议时，直接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系，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内容，是顺利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是解决我们在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保持我国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势头，不断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紧密结合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部署，夯实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治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都离不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从全面从严治党来说，习近平总书记也作了深刻论述。他指出，我们党是一个拥有 8600 多万党员、在一个 13 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三大战略举措，都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也要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三大举措实施得不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就要受到影响，目标就不能保证实现。

三大战略举措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必须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互相渗透，共同推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由党来领导，因此，就必须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也必须由党来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也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同样，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正确处理改革创新与于法有据的关系，在改革的过程中及时做好法律立、改、废的工作。而全面依法治国，也要坚持改革方向和问题导向，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

正确理解“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先后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作出了规划和部署。这种演化过程可以大致梳理如下。

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1987年，十三大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认为，这就是一个根本的战略布局。所以，1989年11月，他强调：“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

随后，党中央逐步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2005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将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扩展为五位一体。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在阐发十八大精神时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按照这个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是什么关系？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在中央没有明确界定之前，我们可以尝试着做些分析：从总体布局的发展过程来看，总体布局是可以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而有所调整、有所补充的。在新的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战略布局，体现了十八大以后新的中央领导的执政理念和思路，具有新的特点和风格。这“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到底是从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是互补关系，还是取代关系？现尚无定论。不管什么关系，这“四个全面”，突出了新形势下治党治国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坚持这样的布局，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四个全面”都已经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八大以来最新确立的战略布局。它更加完整地展现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总体思路和框架，也进一步突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

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坚持“四个全面”，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战略导引。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四个全面”展现治国理政的新型

方法特征

2015年03月01日

来源：光明网

“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是新一届党中央在治国方略上开拓提升出的新版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就和新境界。其理念、框架、具体安排和主攻方向展现了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新型方法特征。

一、整体协同的系统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反映的是国家治理的四个不同方面和不同环节。但是，它们构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两个层面的系统性。在第一个层面上，这四个方面中任一方面都是一个整体系统，都由不同要素和部分组成，各个部分之间都有机关联和互相影响，都需要统筹兼顾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第二层面上，这四个方面也构成一个整体系统，也需要整体协同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它们之间是目标、手段、保障、主体四大要素的关系，四者缺一不可，其运作必须互相配合、共同推进。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这里讲的实际上就是国家治理的这种整体协同的系统性。

二、远近结合的制度设计

“四个全面”最为重要的内在筋骨在于制度。仅从表述就可看出，其中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主体内容都是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提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两次全会的决议清晰说明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主体目标和着重点是制度建设。实际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从严治党也包括大量制度建设内容。“四个全面”中的制度建设既是为“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也是为更为久远的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提供可依赖的路径。也可以这样理解，当前工作中的一些政策、手段、方法、措施可能随着时间的演进、条件的变化而取消或放弃，但制度建设却既有当前的现实功能，也具有极为长远的未来意义，因而是更为根本和深层的工作。

三、互相渗透的设计安排

作为一种战略安排，“四个全面”必须顾及长远和当前、整体和局部、理论和实践等多种社会层面，这就要求其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其内在的关联和深层的逻辑。结合中央的各种文献和习近平的多次论述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近期目标和愿景，全面深化改革是手段和方法，全面依法治国是途径和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领导主体的建设。这四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渗透，在实际工作中既融为一体，又各有偏重。比如，全面从严治党的当然包括深化改革的内容，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变化就是一种典型的改革。再比如，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重要目的就是服务于小康社会的建设，人民福祉毕竟是所有工作的指向。从总体上看，“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螺旋递进，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动态体系。

四、基于实践的主动创新

毫无疑问，“四个全面”的提出基于当前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对这一实践的政治总结和理论升华。这充分表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主动创新的态势和动能，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不墨守成规、勇于开拓、善于创造的勇气和能力。“四个全面”的每个方面都是我们党主动承担历史责任、寻求全面解决社会难题的探索。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各级党委、各个部门和领导干部提出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要求。比如讲到“从严治党”时他说，这是全党的共同任务，需要大气候，也需要小气候。各级党组织要主动思考、主动作为，通过营

造良好小气候促进大气候进一步形成。也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通过发挥自己工作的主动性为从严治党做出贡献。

基于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每一个执政党都具有自己治理国家的方法体系。面对今天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在总结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的治国理政的方法系统，“四个全面”的表述反映了一系统继往开来的特征。

习式改革战略的六大突破

施雪华

2015年02月27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带头人以来，已经有两年多时间，国内外对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新思路、新做法有众多积极、正面、热烈的评价，习式改革战略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大突破：突破了过去从易到难、由点到面的“局部性改革模式”，开始了全方位、配套性的“整体性改革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改革事务千头万绪，开放问题错综复杂，之前也没有多少现存经验，因此，不敢也无法进行全方位的、整体性的改革开放，因为，风险实在太太大，只能从一些利益涉及面不大、大家容易接受的浅层次的改革上做起，从某些地域、某个领域、某些行业、某些单位、某些事项上先进行试点、突破，再行推广。最初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在农村改革积累经验后再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有一定经验后再开放，而开放先从南方的一些小城市开始，然后，到沿海、沿江、沿边的大中城市，最后到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农村改革也是从局部如经营方式改革开始的，最初并没有触碰农村的组织结构，后来逐步实行村民自治。城市改革也是从局部开始的，先是搞企业生产经营承包制，然后，是所有制改造，搞混合所有制等。这样的改革有其优点：比较稳妥，要有问题也是局部性的，纠错比较容易，但这样的改革也有其缺点：新旧规则同时并存，实行双轨制使制度的漏洞比较大，寻租空间比较大，容易滋生腐败，也容易导致人群和地域间的贫富差距拉大。据统计，2013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7%，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0.473；2014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4%，基尼系数为0.469，连续6年下降。有专家称，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有所缩小，但收入分配改革仍需提速。目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确实是影响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2012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后，果断地开始了“整体性改革模式”。与“局部性改革模式”相比，“整体性改革模式”突出全方位改革

和配套性改革两个方面。全方位改革意味着，既要发展，但也要反腐，既要进行地方改革，也要进行中央改革；既要进行经济、社会、文化改革，也要进行政治、行政、司法改革；既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要进行国内事务的改革，也要积极参与国际和全球事务。配套性改革意味着，从改革开放的整体需要和总体目标出发设计改革开放的法律、制度、政策和措施，注重法律、制度、政策和措施之间的有机性、关联性、配套性，不再让某项法律、制度、政策和措施单兵突进，而是讲究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缺，避免互相矛盾、互相冲突、互相损耗。例如，之所以在最近两年提出“自由贸易区政策和制度”并迅速推进，不再是推进某个地方发展的局部需要，也不再只是涉及解决改革或开放某个方面问题的需要，而是从整体上快速提升中国改革开放水平，快速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总体需要，即是因为考虑到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内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外部重建世界新秩序需要快速发挥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优势，在世界力量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相信有“自由贸易区政策和制度”与“一路一带”等其它措施相配套，中国不会再丧失当前发展良机。

第二大突破：突破了过去经验性、实验性、零散性的“感性改革模式”，开始了顶层性、设计性、普惠性的“理性改革模式”

在缺乏现存经验和模式的情况下，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走的是从下到上、事中和事后“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基层和地方先试验、先摸索，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改正错误和失误，加以完善，然后推广。这种改革模式比较容易发挥百姓、基层和地方的首创精神，有不妥的地方随时可以纠正，影响小、易掉头，比较稳妥。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和深化，这种改革模式的不足之处也逐渐暴露，改革比较零散、缓慢；时间成本和实验成本比较高；容易使人只看到改革的一鳞半爪，而无法领会改革的全局和整体；感性色彩浓厚，理性思考不足，法治特点不明显；改革红利的受益者、受益面和普惠性不够，容易产生比较性心理失衡和社会对立对抗；改革的预见性、准备性不足，走一步算一步，改革缺乏总体性、长远性、可持续性。改革开放初期这么做是必要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2012 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后，看到了这种改革的不足，此后的改革十分注意总体性、长远性、可持续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涵盖 300 多项改革举措，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虽然专门讲法治，但仍然涵盖了 180 多项改革举措。中央把改革涉及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问题都进行了长时间的理性思考、顶层设计和原则规定，部门、地方、基层和单位只要按这些顶层设计和原则规定加以具体贯彻和灵活落实就可以了，这就大大减少了改革的时间成本和实验成本；这样的改革红利几乎所有地区、所有人群均可受益，受益面广、普惠性强；这就使改革从浅层次的、盲目的、感性的、零散性的改革走向了深层次的、前瞻性的、法治性的、普惠性的理性改革。这样的改革对于克服日益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对抗问题，顺利推进改革开放进程有着关键性作用。

第三大突破：突破了过去主要着眼于新增社会资源分配改革的“增量改革模式”，开始了对原有和新增社会资源分配同步改革的“增量与存量改革相结合的改革模式”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新中国打破了旧中国家族性、阶级性特权问题，可是，由于实行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经济形式、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形式、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形式，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打破“新特权”。所以，改革开放后的 30 多年时间里，改革的重点在于对新增加的社会资源或曰国民财富的新分配规则，即“增量改革”，对于改革开放前已经有的大多数特权或曰分配格局触动的并不多，即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存量社会资源或国民财富的“存量改革”。如，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在食品供应、医疗保健、住房分配、出行安保、旅差报销、度假安排、公车乃至专车使用、工作餐补贴、家属子女上学和就业安排等方面一直拥有不少特权。这样，老百姓就有很多怨言，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官民对立，不利于中共执政地位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2012 年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对大多数特权进行清理和改革，特别是对住房分配、出行安保、旅差报销、度假安排、公车乃至专车使用等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如，清退地方和军队多占、超标住房，重新制定干部度假的规章制度，每年中央领导去北戴河等地开会度假的时间缩短并规定家属子女、家里佣人一律不再随行，国有企事业单位一些内部特权如分房和补贴等大大减少。至于对普通干部的“八项规定”更是众所周知、影响深远。当前中央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的清理、评估、管理、监督正加

速进行等，这都是对存量和增量国民财富的同步改革。虽然动了有些特权阶层和集团的已有“蛋糕”，遭到了他们的竭力抵制和反抗，但一方面，中央铁腕推进反腐败的决心更强，对存量国民财富重新分配的力度会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对新增国民财富的公开、公正、公平分配，如，对国有企业上缴国家财政比例的大幅提升，对畸形文化市场的大力整顿，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大力推广。这样的改革当然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和普通老百姓的强烈拥护。

第四大突破：突破了过去点滴摸索、验证纠错、逐步推进的“渐进改革模式”，开始了短期验证、全面总结、快速推进的“渐进改革与快速改革相结合的改革模式”

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基本上实行“渐进改革模式”，即一项改革措施或开放政策从试验到推广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验证、纠错、完善过程，因此，改革和开放在时间、地域、领域、行业等方面都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任何一项改革或开放政策先在某个单位或地方试点几年甚至 10 多年，然后，总结经验，加以完善，最后逐步推广。1978 年、1979 年农村改革（家庭联产责任制等）先在安徽、四川等地实验，1982 年 1 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91 年 11 月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可见，光家庭联产责任制这一项改革从 1978 年提出到推广就有 5 年，全面完善要到 1991 年，花了 12 年。从 1979 年试办四个经济特区，到 1988 年设立海南经济特区，花了 10 年。中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从 1984 年设立 10 个，到 1991 年 14 个，到 1995 年 533 个，花了 11 年。从 1979 年沿海地区开放，到 90 年代前期沿江、沿河、沿边开放，到 2001 年全方位开放，花了 22 年。2012 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后，一些重要的改革不再渐进，在短时间试验后如果觉得可行，马上全面总结，并快速推进或推广。又如，自由贸易区 2013 年上海刚被批准设立，2014 年又有广东、天津、重庆、厦门 4 个自贸区被批准，2015 年有更多更大的自贸区被批准。2012 年以来中国的各项改革开放政策和措施虽然还有试点、推广的步骤，但间隔的时间已经很短，不再渐进，正像习近平总书

记说的，看准了就要赶快做。原因是，一方面，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现在不需要再一点点摸索了；另一方面，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提升，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风险不大，即使有一定的风险，我们的抗险能力比过去已经强多了。所以，适时地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是顺应世界潮流、顺应民心的好举措。

第五大突破：突破了过去社会改革先于并快于国家和政府改革的“被动式、跟进性改革模式”，开始了国家和政府改革与社会改革同步推进的“主动式、共时性改革模式”

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可是，由于长期的“左倾”思潮，大多数中国人依然相信“闭关锁国”的政策是正确的，所以，改革开放初期要挽救党、挽救中国、挽救人民，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给大多数人以积极示范和致富榜样，先富裕百姓、稳定社会才有可能让大多数人拥护“改革开放”。于是，党和政府首先放松国家和政府对社会企事业单位、家庭、个人等自主生产、自由流动、自主择业和创业、自由言论等“社会自由”的管控，政府部分退出了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等纯粹“私人事务领域”，让社会和公民“活”起来。但毕竟是改革开放初期，长期的计划经济和政治控制已经成为部分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习惯性思维和行为取向，国家和政府对社会事务还有较多的管控，国家和政府职能没有实质性转变，国家和政府改革落后于社会改革，也实属无奈。所以，那个时候实行“先富”改革政策，只是部分开放“私人领域”并没有错，可是，30多年过去了，这一改革政策、实践做法也带来了政府职能过宽、过大，党政干预太多、太深，“贫富差距”过大，腐败日益蔓延，社会自组织难以快速成长、壮大，社会自治能力低下，国家和社会运行效率和效能“双低”的严重后果。2012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后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努力增加社会保障，提升最低工资水平，提高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设施、交通能源、市政设施、生产和生活信息提供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更加注重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让更多的老百姓分享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大力培育和扶持营利性、私人领域和社会组织和半公半私领域的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的自治空间和能力，另一方面，以壮士断

腕、自我革命的气魄，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大幅放权、让利，如，国务院近两年就取消和下放了行政审批权 416 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 348 项，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国务院 60 个部门集体晾晒“权力清单”，涉及行政审批 1235 项。按照国务院要求，各部门不得在“权力清单”外实施审批。地方政府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权达数千项，提升国家和政府自身的运作效能和治理社会的效能。再一方面，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还十分重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激活社会活力和自治能力，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国家和社会合作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第四方面，习式改革战略已经突破了“法制改革模式”，开始了“法治改革模式”。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主要靠党政领导的气魄和智慧，制定和实施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某些原因，一些法制在部分党政领导和干部面前就成了摆设或主要约束普通群众的工具，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情况依然存在，这就是过去三十多年的“法制改革模式”。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后开始了“法治改革模式”。法律、制度和纪律，不但约束普通群众，而且还更多地约束执政党、国家和政府及其领导人，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开出“权力清单”，试图“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第六大突破：突破了旧有的传统外交战略，开始了自信有为、主动担当的“大国气派开放模式”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生活在压抑、屈辱、愤怒、不服的境况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一直有一个洗刷民族耻辱，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赢得了独立和尊严，有了扬眉吐气、一洗国耻的感觉，但长期的政治运动和计划经济把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逼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中华民族有了独立和尊严，但实际上是有限的独立和尊严，即因综合国力有限，中国在世界上的实际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地位和影响力有限，中华民族还没有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物资短缺、产品和技术落后、外汇很少、人才奇缺、信息闭塞、视野狭小，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外部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产品、信息等输入，在中国的综合国力还很有限，对外部依赖性很强，民族复兴尚待时日的情况下，低调处理中国与别国，特别是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

大国的关系，在诸如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南海撞机、联合国改革、中国加入 WTO、中国申办 2000 年奥运会等问题上，中国不单不当头、少举旗或不举旗，而且，还特别懂让步，会妥协，能吃亏。2012 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后，审时度势，在外交上开始了“大国气派开放模式”。这种新的对外关系战略与模式是在深刻洞察世界发展总体走向——和平与发展趋势不变，而国际关系整体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变化的前提下，以一个大国的自信和气魄为基础，采取大国对大国（新型大国关系战略和政策）、大国对小国（对周边国家的亲、诚、惠、容的战略和政策）、一对一（对非敌非友的大国的适度紧张战略和政策或曰温水战略和政策，对友好国家的准同盟战略和政策）、一对多（帮助非洲国家“筑巢引凤”的战略与政策，帮助拉美国家走出危机困境的“大棋局战略和政策”）、多对多（互利共赢、平等合作的战略和政策）的不同国际关系战略和策略，形成一种独特、新颖的国际关系模式，让中国逐步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建构者和过程者之一，即在国际关系中实现有限度的争取有所作为，主动承担国际义务，积极参与构建国际新秩序。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迫使美国、欧盟、日本等国接受中国的“共同但有区别”的环保原则及中美排放量指标；在东海、南海迫使美国等国承认或默认中国划定的防空识别区的有关规范和岛争的现实；在世界各地资源（资本、技术、产品、人才）和机遇（举办奥运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20 国集团会议等）的竞争中学会既坚决斗争又互相妥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参与建构“金砖国家组织”及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规划联通世界的“一带一路”等。这说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也在快速提升，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自信性不断增强，中国的对外关系模式已经趋向成熟和稳定。

总之，习式改革战略是一种对内更加整体发展、理性发展、公平发展、透明发展、民主发展的发展模式，对外更为自信发展、主动发展、共同发展的发展模式。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能突破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实行新的改革开放模式，主要是因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财富积累和综合国力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世界和区域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累积和教训汲取有了重大

变化，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领导层的价值观念、认知水平、思想高度和深度有了重大变化。目前习式改革战略虽然已经有不少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方面的创新，但主要还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形态的创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相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不断创新习式改革战略的形式和内容，从而使其外延和内涵更加拓展、更加丰富，创造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新的伟大的中国奇迹。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导）